

美國共和黨保守派主政時代： 哈定、柯立芝和胡佛總統（上）

伍啓元

一九二〇年美國大選，共和黨保守派以壓倒性的勝利，在外交方面拒絕了威爾遜的國際合作政策和加入國際聯盟的要求，而在內政方面結束了二十年（一九一〇至一九二〇）的進步主義。共和黨保守派了解人民心理厭戰，並對各種內政改革感覺疲倦。大部份人都渴望回復戰前的平靜生活。哈定提出恢復『常態』的口號，得到選民的廣泛支持。他得到一千六百萬的選民選票（佔百分之六二·二）當選總統。共和黨在國會上下兩院都佔有很大的多數：在眾議院超過民主黨一七二席（303比131），在參議院超過二四席。此外在各州地方政府共和黨也有重要的勝利。

哈定並沒有十分明確地界定甚麼是『常態』（normalcy）。大體說來，他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或二十世紀前的比較簡單與平靜的生活。他要求的是『恢復』（restoration）而不是『革命』（revolution）。在那個常態中，美國將比較孤立（除對美洲國家堅守門羅主義外，將盡量不介入歐洲事務），比較接近國家主義，同時也可能熱心支持和平主義。在經濟方面，常態是一方面指十九世紀的經濟放任主義，包括減低國內稅率，而另一方面採取經濟國家主義（或保護關稅和財政的保守主義，包括政府收支平衡、減少國債）。有些歷史家用“isolation and laissez-fair”和“normalcy and nationalism”來代表一九二〇年代哈定和柯立芝兩總統的政策的特徵（註一）。同時保守主義者稱這個時期為『新時代』（New Era）。

我們用孤立主義和國家主義來說明哈定和柯立芝的常態政治，大體上是準確的。但在這裏有一個重要的例外，必須立即指出，即於一九二一年由哈定（註二）召開的華盛頓會議。美國在這個會議所採取的立場，既非孤立主義，也非常態政治。這個會議的決定對世界和平和太平洋安全有重大的影響。但這個會議順利完成後，却有助於美國推行一種傾向於孤立主義的常態政治。更廣泛地說，對外採取和平主義，是與常態政治沒有矛盾的。

由於一九二一年華盛頓會議的特殊地位，我們在討論哈定的常態政治和柯立芝的常態政治前，應先討論由哈定總統召開的華盛頓會議。哈定本人認為這個會議的成功是他主政期間的主要成就。在會議結束後國會參議院對會議所訂定的條約投票批准前，他對一位友人說：『這個政府的成功或失敗，將決定於國會參議院批准或否決這些條約。每一個政府的聲譽，通常是基於一件或兩件成就。如果這些條約得到參議院的批准，則這個政府在歷史的地位是穩固的。如果它們被否決，則在我的任期終結前，我所能得到的成就，恐沒有比這個更能引起我的興趣。』（原文見註二所列 Francis Russell 所著書頁四八五）。我們同意哈定總統

對華盛頓會議的評值。

華盛頓會議：哈定的外交成就

世界的重要海軍強國，有多次舉行海軍事務會議，討論裁減海軍、海軍有關的國際法等海事問題。第一次會議是由英國召集，於一九〇八年開始的倫敦會議。由哈定總統於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召開的華盛頓會議，是第二次會議。事前哈定總統和國務卿休斯及代表羅德（Eltha Root），均作相當詳盡的準備工作。哈定邀請參議院共和黨和民主黨在外交委員會的領袖參加美國代表團。所有重要海軍國家和對太平洋有關國家，都被邀參加。前者包括英國（由前首相巴爾福率領）、法國（由首相白里安率領）、意大利、荷蘭、葡萄牙等這些國家都對太平洋有大的興趣。日本一方面是海軍重要強國，一方面是亞洲重要國家。後者包括中國（代表是駐美公使施肇基和駐英公使顧維鈞），和大英帝國的印度和澳洲。會議設有遠東問題委員會。

會議於十一月十四日正式開會，首由哈定總統致詞。他的講詞簡短、扼要、誠懇、和動人。他首先提及開會前一天他去主持美國在戰爭中的無名英雄的葬禮，他說美國千萬或萬萬人民都希望這種犧牲不會重演，因此他勸請這次會議努力完成它的和平使命。這次演講頗受各國代表的歡迎。

（這個會議所以召開，是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兩個嚴重的發展；一是美國、英國、日

本及若干其他國家都競建海軍。一是日本在亞洲對中國侵略，並希望取得德國在中國所佔有的土地和利益。這兩個發展如不加以防止，很可能會引起戰爭。）

哈定總統演講完畢，即離開會場。會議由大會主席美國國務卿休斯主持。休斯一開始便明白指出當時日本、英國、和美國都從事建造海軍軍艦的競爭，這是浪費資源，並有引起武力衝突的危險。他建議三強在十年內不再建造軍艦，同時同意立即減少現有的海軍數量。他代表美國宣告，美國願意立即廢棄三十主力艦，如果英國同意廢棄十九主力艦，和日本同意廢棄十七主力艦。休斯並說明美國願意廢棄的三十主力艦，其中一半是現役的軍艦，另十五為在建造中的主力艦。他把在建造中的十五軍艦的船名都細列出來，共值三億三千萬美元。他也大概地指出他希望英國和日本廢棄甚麼軍艦。大會聽了這麼直接、具體、而慷慨的驚人建議後，作了一瞬息的靜止，然後聽眾的旁聽席上發出熱烈的歡呼和雷鳴似的掌聲。大會休會於兩天後復會。

兩天後代表們已得到本國的訓令，復會時沒有代表在原則上提出異議，只有法國代表說在廢棄任何軍艦前，英美應向法國保證如德國攻擊法國，英美將援助法國。但各代表對於具體裁減時都有很多爭議。經過了兩個多月的協商，結果主要海軍強國同意下列的協議：英美日同意於十五年內維持「五·五·三」的海軍比率，並且同意在十年內不再建造任何主力艦

，包括為替換現有的軍艦而建造的新艦。法國和意大利海軍，應各為日本的一半。我們應該指出，這項裁減海軍的協定，只限於主力艦，並不包括潛水艇或其他軍艦。（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這些非主力艦在戰爭中是佔有很大的作用的。）這個裁軍條約有效時間至一九三六年底。

華盛頓會議設立「遠東問題委員會」。在這個會議中，對維護中國的領土完整，是得到大家同意的。日本代表加藤在第二次會議中宣稱日本願遵守門戶開放主義。該會正式通過美代表羅德所提出的關於中國問題的四項原則。但對中國代表團先後所提出的各種問題，則大都沒有得到滿意的答案。該會在一些小項目上同意中國代表的要求，如通過取消在華客郵，和答允於開會後四個月在上海開會修正關稅。但委員會並沒有解決中國代表所提出的下列問題：租借地和租界、治外法權、外國軍警等。中國所最關心的山東問題和日本過去提出二十一條款，亦只能得到局部的解決。會議產生了九國條約，維持中國領土完整和繼續門戶開放主義。

華盛頓會議又產生了美英日法四強條約，四國同意彼此尊重其他各國在太平洋的屬地和權益。這個四強條約成立後，英日同意取消了他們兩國的同盟，這對美國是有利的。因為它是一個四強條約（而不是三強條約），美國不會受任何兩國的控制，這是另一優點。日本正式承諾尊重美國在菲律賓和在關島的主權，也

是一優點。但美國為着取得日本同意這個條約，曾答允不在馬尼拉和關島特別設防或加強防衛，使日本容易直接向夏威夷進攻，則是一個不應支付的代價。但當時大家都假定日本是不會向美國進攻的。

華盛頓會議所有條約，都得到參議院的批准。它確是哈定任內最重要的成就。

在外交方面，哈定就任不久，就與德國及奧匈訂立和約，結束戰爭，享有巴黎和會所規定的各種利益。

哈定的內政措施

一九二〇年哈定競選的勝利，有些歷史家認為這只是代表人民對威爾遜政策的不滿。我們認為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我們同意另一個看法（註三），認為哈定所以得到大多數選民的支持，是因為他是一個溫和的人，他沒有引起反感，他主張和解與合作，他主張設法使經濟繁榮，他主張回復比較安定的常態，他主張減低租稅和節省政府支出，是符合一般人民的想法。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確有許多重要問題，是急待解決的；(1)在戰時，許多重要企業（如鐵道、電話和電訊、廣播等）都由政府接收、管理、及控制。戰爭結束後，究竟應否發還民營和在甚麼時候發還民營呢？大體說來，共和黨是主張發還民營，並且立即發還。民主黨則認為有一部分應繼續由政府控制，或至少控制若干時日。哈定的回復常態在這方面是指交還民營

——迅速地交還民營。事實上由共和黨保守派控制的國會早已通過法案於一九一九年七月底把電訊事業交還原主，於一九二〇年三月初把鐵道交還原主，但政府予以若干津貼與管制。輪船的問題較為困難。因為平時需要不大，輪船公司不易維持一個從國防的角度應該維持的船隊。對輪船如何處理，是一個爭論的問題（註四）。

(2) 復原問題和失業問題，是另一個兩黨爭論的問題。大體說來，威爾遜總統集中注意力於和約問題和國際聯盟，對許多軍人回國後的位置問題和整個經濟復原問題，都不加以注意。結果引起經濟衰退和失業增加的現象。如何應付經濟恐慌和恢復繁榮，是另一個爭論問題。哈定的回復常態是指回復十九世紀的經濟放任主義以引致繁榮。

(3) 由於經濟衰退，由於失業增加，及由於其他原因，工人很多不滿現象，希望改善待遇。同時在戰時經濟繁榮，需要增加，工資增漲甚多。戰爭後雇主認為工資應該減低。究竟對工人和工資應採甚麼政策，是另一個爭論的問題。哈定的回復常態是指依據當時資本家的要求，把工資降回一九一七年的水準。同時哈定的回復常態，也帶了若干「反共」的成份。戰後在俄國共產黨已成功地取得政權，共和黨保守派極為不滿。對工人罷工等行動，相當反對。因此回復常態也表示回復到一種沒有工人階級給予社會任何威脅的情況。

(4) 在戰時不只工資高漲，物價也上漲甚多

。回復常態另一個含義是回復戰前或至少美國參戰前的物價水準。

(5) 因為戰爭的需要，稅率增加甚多，且增征超額的利得稅。哈定的回復常態是指把稅率降低，至少降低至戰前的水準。

(6) 威爾遜總統任內，把關稅降低甚多。共和黨保守派是主張提高關稅，以保護國內生產事業。哈定的回復常態是指回復過去保護主義的關稅。

哈定在他接受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的講詞中，亦即他提出「回復常態」的口號的演講中，即具體提出下列的主張：鐵道歸還民營、經濟放任自由、工人問題、物價安定和貨幣安定、減稅、提高關稅等政策。此外提出嚴格執行法律、推進國家主義、和反對參加國際聯盟等項目。我們應該說他所以能以壓倒性的多數當選總統，主要是人民當時積極地贊同他的政策。至於不滿威爾遜只是一個次要的因素。

哈定的常態政治不只是哈定任內的施政方針，並且也是他的繼任柯立芝總統的施政方針。歷史家常稱常態政治是哈定與柯立芝時代的政治（註五）。後來在胡佛總統的任內，他的施政方向，也是與哈定和柯立芝相同的（註六）。

在我們進一步討論哈定的內政措施前，我們先討論與哈定有關的政治賄賂和政府腐化問題和與哈定有關的桃色新聞；並略述他的主要內閣閣員。

大體說來，哈定是在美國賄賂事件和桃色

新聞最多的一個總統（註七）。關於貪污舞弊問題，哈定還可以說是比較正直的，他沒有自己貪污或接受賄賂。但他的同僚——尤其是從俄亥俄州追隨他或支持他的人——則不少是貪官污吏，引起了不少貪污案件。其中最嚴重的是他的內政部長福利（Albert Fall）和他的檢察長都給提（Harry Daugherty）。福利和不少哈定的屬員，後來都因賄賂貪污的案件，受到法律的制裁。這些案件大部份是在哈定死後提出，對哈定生時並沒有重大的影響。都給提比較小心，且他的貪污行為大都是「超法律的」或「查無實據」的。結果他只得到柯立芝總統要求他辭職的處分。哈定的桃色事件比較嚴重。他很早就和年輕的女孩發生關係，且留下不少情書在她們手上。其中他最深愛的為他生了一個女孩。這些桃色事件在他接受總統候選人提名時，已在他的俄亥俄州得到一些注意。但在全國這是在他死後他的情書被發現時才得全國的注意。因此在他生時這些桃色新聞也對他的政治活動沒有不利的影響。

他當選後所任命的閣員，大都是選自富有階級。其中一部份確是共和黨比較有能力的幹才。這包括國務卿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共和黨保守派推薦的財政部長梅倫（Andrew W. Mellon）、他自口堅持任命的商務部長胡佛（Herbert Hoover）、深受農民支持的農業部長華萊士（Henry Wallace）（但哈定對華萊士所提各種協助農民的建議，很少加以採納）。另一部份的閣

員大都是因與哈定本人或與共和黨保守派領袖有關係而被聘任的。其中有三個人在任內並不發生多少作用：他們是軍政部長（John W. Weeks）、海軍部長（Edwin Denby）、和勞工部長（James W. Davis）。但後來哈定去世後海軍部長因油田問題而辭職。其餘三個人都屬於「貪官污吏」。他們是：①郵政局長（Postmaster General），由海斯（Will Hays）擔任，負責符合傳統和符合常態的各種合法的貪污工作。多年來郵政局負責把郵政局的各地工作，分派給對執政黨有功的人員。海斯是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擔任這種工作十分適宜。事實上在威爾遜總統任內，郵政局長也負責相似的工作，但威爾遜把郵政局一萬三千個職位列入文官制度，用考試方法任用，不屬局長分配。哈定出任總統，立即把這一萬三千個職位自文官制度收回作局長分配的職位。②檢察長（Attorney-General）由都給提擔任，負責符合傳統和符合常態的各種半合法的（即超法律的或查無實據的）舞弊工作。這些工作包括決定甚麼案件要提出或不提出公訴，和決定如何選任各級法官。都給提是哈定的競選主持人。根據美國的傳統，檢察長通常是由競選主持人出任的。③內政部長由福利出任。福利和哈定同時在參議院擔任參議員。福利和哈定在參議院的坐位是相連的。他與哈利又過從甚密。哈定出任總統後，即任命福利為內政部長。哈定總統同時安排把原屬海軍部管理的留作公用的油田（包括 Teapot

Dome 油田）轉給內政部管理。後來福利接受某石油公司的賄賂，把油田租給該公司。結果引起國會的調查。福利被提起公訴並被判徒刑。這就是所謂 Teapot Dome 舞弊事件。再過一些時日，海軍部長（Denby）也因受與油田舞弊案有關的流言的影響，在哈定去世後辭職。同時退役軍人管理局也有嚴重舞弊情況。此外還有一種在一九二〇年是沒有違法的行為，例如當時財政部長梅倫向國會建議提高關稅，包括把鋁的入口稅大為提高。他本人因是美國鋁公司的主要股東，獲利甚多。這在當時是完全合法的。但實際上也是一種舞弊貪污行為。

哈定總統和他的閣員因與國會感情很好。他在最初的一年多，就把他的主要常態項目完成立法手續。在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通過的重要法案，包括下列各項：

(1) 關稅法案：哈定總統於就任不久，就於一九二一年四月致函國會表示他贊成保護美國生產事業。國會即把會通過但被威爾遜總統否決的關稅作為一緊急關稅法案送給總統，他於五月十七日簽署。國會隨即進行擬訂一較永久的關稅法案。經過一年多的工作，一九二二年九月完成一高度保護的關稅法案（the Fordney-McCumber Tariff Bill），是美國在平時進口稅稅率有史以來最高的法案。

(2) 預算及會計法案：這是哈定總統第二個重要法案，也是他於就任開始時就請國會擬訂的法案。威爾遜總統於戰爭結束後，為著要改

進財政管理、解決國債、和減低租稅，曾要求國會擬訂法律，成立預算制度。國會隨即通過法案，大體上依照威爾遜的主張。但因有一小點威爾遜認為是干涉行政權，不合憲法，予以否認。哈定重申威爾遜的要求後，國會即將法案擬定，哈定於一九二一年六月簽署為『預算及會計法案』(The Budget and Accounting Act of 1912)。這個法案樹立了美國聯邦政府的預算制度，成立了預算局。哈定任命道斯(Charles Daves)為首任預算局局長(註八)。這是一個具有建設性和永久性的措施。

(3) 新移民法案：哈定總統於就任開始就簽署的另一個重要法案是移民法案。這個法案對移民嚴加限制：①排斥亞洲人：所有亞洲人不許入口。②用百分率限額歧視南歐和東南歐的人口：把每個歐洲國家的每年移民限額限為該國於一九一〇年在美國居住的僑民人口百分之三。因為西歐和北歐各國的僑民很多，所以他們的限額很大。南歐和東歐的限額就遠較前者為小。

他於一九二一年四月十二日第一次致國會咨文，提出常態政治的主要方案。在內政方面，除了上述三方案外，他提出政府節減支出、減低稅率，建立一個強大的海洋商船隊，創立一個全國的公路系統、減低鐵道運費、加速成立和管制航空事業和廣播事業、完成新的農田信用立法、完成婦女生產立法、禁止對黑人處以私刑、和成立公共福利部(Department

of Public Welfare)。從咨文所列的內政方案，我們可以說提高關稅、減少政府支出、降低租稅等確是回復戰前常態的方案。樹立新的預算和會計制度，確有助於上述常態方案的推行。其他對內方案，都是適合戰後新情況的方案。上述的最後三個方案，則屬社會改革的方案，把它們包括在常態政治內，則常態政治遠超出『回復常態』的範圍。咨文在外交方面所包括的方案，我們在上一段已把它們的實施情況，加以說明。

國會大選失利哈定西行

哈定的常態政治內政方案，大都在就任的一年多予以實施。但整個經濟並沒有回復常態。相反的，在一九一一年和一九一二年，戰後經濟衰退，繼續影響每一個人的生活。同時哈定總統，對協助農民，並不熱心。工人因感覺哈定的許多措施都是反對工人的，也表示不滿。此外退役軍人管理局等舞弊事件和若干流言也大大地傷害總統的聲名。結果在一九二〇年的國會大選，共和黨失去很多議席。雖然共和黨在上下兩院仍佔多數，但兩黨在上院或下院的差別只有幾席。因為共和黨議員包括若干代表農區的議員，結果共和黨保守派或常態政治的支持者已失去控制國會的力量。

在一九二二年大選後和一九二三年初，哈定遭遇下列的困擾：①共和黨的領袖不少人暗示如局勢不改善，則他們在一九二四年總統大選時將不支持哈定為總統候選人。②有若干他

提出的方案，得不到國會的支持。在數目方面，這種情形雖然不多，但有些他感覺他應設法力爭。例如在外交方面，他感覺美國既拒絕和約，不加入國際聯盟，至少應對國際和平，作若干努力。因此他接受休斯和胡佛的建議，決定參加設在海牙的國際法庭。他的建議國會在休會前不予討論。為着爭取民眾對這些問題支持他的建議，他決定到西方各州向民眾作一系列的演講。他這次西行與威爾遜的西行十分相似。他要由華盛頓到最西的亞拉斯加。沿途在各地演講。他計劃返經三藩市和洛杉磯。

他在米蘇里州的聖路易市作首次的演講。他選擇這個孤立主義的城市來發表一篇主張參加國際法庭的演講，是很有意思和很有勇氣的。這個演講，是一個美國總統的演講由廣播公司現場廣播到全國各地的第一次。在他旅行這些地方，一方面天氣很熱，一方面居民很多是農民——正在遭受經濟衰退和農產價格下降的嚴重打擊的農民。在這種環境中，他的體力和精神都受到很大的壓力。他在各地旅行和演講都是很費力的。到了亞拉斯加後，就開始患病。到了三藩市病況轉劇，於八月二日去世。

哈定死後，在他任內的屬員的各種貪污舞弊事件繼續發現。在歷史上哈定的一任總統被認為是美國最貪污、最腐敗的政府。再加上他的桃色新聞，他的聲名是很低的。但我們應該同時指出，他本人是正直的。他只是能力有限和任用若干性情貪污和不守法的俄亥俄州的舊友出任官職，結果引致許多貪污腐敗的事件。

哈定政府兩年多也不是完全沒有成就的。他任用休斯和胡佛，在外交和商務方面確有若干貢獻。華盛頓會議是哈定的最重要成就。他在死前為爭取參加國際法庭所作的努力，是值得稱許的。此外如果你是一個保守主義者，你會欣賞他所提出的常態政治的旗幟，和同意他在財政上的大部措施。如果他不是在戰後經濟衰退的時期出任總統，他可能有更大的成就。

柯立芝總統——常態政治的推動者

哈定死後，柯立芝（註九）繼任總統。柯立芝於一九一九年出任（以副州長升任）麻薩諸塞州州長，是一個很正直和很保守的政治家。他就任麻州州長後因用民兵去解決一九一九年波士頓市警察罷工，變成一個全國知名的州長。他隨即正式以大多數選票繼續州長職位。在一九二〇年的共和黨全國大會中，於選出哈定為總統候選人後，共和黨領袖提出一個比較傾向進步主義的人為副總統候選人，這是符合美國的慣習。（因為這可以得到較多人的支持。）但共和黨領袖所提出的候選人大部份的代表都不感滿意。當時聽眾呼出柯立芝，隨後俄勒岡代表團正式提出柯立芝。雖然他的政見與哈定相似，立即得到大多數的代表同意通過。這使哈定死後的政權轉移十分順利。「在總統和副總統政見不同的情況下，如果總統在任內去世，副總統繼任總統，則新總統可能完全改變政策。例如一九〇一年馬哀利總統去世時，老羅斯福（狄奧多亞·羅斯福）繼任總統，因二

人政見完全不同，老羅斯福完全改變了政府的政策。」

柯立芝繼位後即表示他將繼續哈定的政策，並要求所有閣員留任。柯立芝原意是在下次大選以前，所有閣員都繼續留任。但在這個時期，國會開始調查油田的貪污事件，結果內政部長福利去職。因同一案件，柯立芝總統接受海軍部長（Denby）的辭職。其後案件擴大，又涉及檢察長都給提。都給提有許多地方無法對總統有滿意的解釋，結果總統於一九二四年三月命令他辭職。大體說來，柯立芝政府是一個不容忍不合法的貪污舞弊的政府，這與哈定政府完全不同。

柯立芝基本上是一個經濟自由主義或放任主義者。政府的工作不應是管理或控制經濟活動，而應該任它們自行活動。除了經濟發生困難與錯誤，政府不應干涉。他在原則上是同意哈定的常態政治，同時因他就任不久經濟由經濟衰退轉為經濟繁榮，使他有機會真正的推動常態政治的經濟政策。他和財政部長梅倫對經濟政策看法相同，他們兩人共同推動下列政策：

- ①減少政府支出；
- ②減低租稅；
- ③減少國債；
- ④再度提高關稅，特別是保護農產品；和
- ⑤繼續推動哈定的常態政治的各種財經方案。

柯立芝的行政風格却與哈定有很大的差別。哈定是很積極的；他對各部會首長充分表示領導的地位。柯立芝則頗接近「無為而治」的作風。除了對前述財經問題與梅倫合作推進外，對所有工作，都授權各部會首長處理。他的

主要政策，都是由閣員建議的。國務卿休斯一方面因他的政治地位很高，一方面因他能力過人，在內閣佔首要地位。他對外交事務，差不多可以全權處理。財政部長梅倫的地位，僅略次於休斯。除了上述幾個主要政策他與總統商同決定外，一切財務行政，完全負責管理。胡佛是另一個地位甚高的閣員，但因他所代表的工商界的利益常與農民的利益有衝突，因此他與代表農民利益的農業部長華萊士意見常常不同。柯立芝總統對他們的衝突不予干涉，聽其自行解決。他認為在一九二四年大選以前，除了前述的兩個例外，他應讓所有閣員留任。後來華萊士於一九二四年十月去世，兩部的衝突才得到解決。因為柯立芝這種無為而治的作風，所以他常被稱為「文雅安靜的總統」（the quiet president）。

他同時用種種方法，改善他與國會共和黨議員的關係。他無論是對內對外，對新聞記者，或對人民都採取溫和及協調的態度。

一九二四年是總統大選的一年，當時希望擔任共和黨候選人的共和黨領袖，數目不少。美國開國以來，直至十九世紀末葉，由副總統因總統死亡而升任總統的都被看為是一種代理總統，從沒有於「代理」期滿後再擔任總統的。老羅斯福因他個人的聲望，和在進步主義開創時期，破了這個傳統。到了安靜的柯立芝，最初大多數還是把他看為「代理總統」。他本人是願意選的，但表面上不能過於明顯。他聘共和黨一位能手——史林彼（C. Bacon Stemp）

——為總統府主要助理。史林彼就任後即暗中向各方面活動，希望大多數能支持柯立芝為總統候選人。柯立芝十分幸運。他的主要競爭對手，一個一個因不同原因（有人因受到忠於柯立芝的部長的打擊，有人因接受了大使的職位出國），先後退出競爭。到了一九二四年元月，只有一個對手（Hiram Johnson）還繼續活動。因這個對手在芝加哥有廣大的支持，柯立芝強使共和黨全國委員會把大會的會址由芝加哥改為俄亥俄州的克利夫蘭（Cleveland）。因為一切都已事先安排，大會很順利地和很迅速地通過柯立芝為總統候選人。但對甚麼人應被選為副總統候選人，則事先沒有準備，只由大會選擇。結果前預算局局長道斯當選為副總統候選人。選舉的結果是柯立芝得到明確的勝利當選總統。選民的選票，他得一千五百七十萬票，民主黨得八百四十萬票，進步黨四百八十萬票。他所得的票數佔全數百分之五四。（選舉團他得三八二票，佔全數百分之七二。）

他當選後內閣有若干變動。國務卿休斯辭，由凱洛格（Frank Billings Kellogg）繼任。他和他的前任一樣，有很大的權力。他對檢察長的空缺，最初提名的人沒有通過，結果由薩爾金特（John G. Sargent）擔任。胡佛還是商務部長，是一影響力很大的部長。農業部長的空缺，由加代尼（William Jardine）出任。他任用的都是共和黨保守派。各部的合作相當良好。例如商務部長

胡佛、農業部長加代尼、和勞工部長大衛斯（James J. Davis）就相當合作。他是一個經濟放任主義者，根本上是反對管制的。因此對各管制委員會推保守派擔任委員。在這些由保守派控制的委員會，它們的工作不再是管制，而變成協助被管制的工商業。這樣地，他們事實上是取消了管制制度。

在一九二〇年代的三個共和黨保守派的總統中，柯立芝是最幸運的。哈定和胡佛都受到經濟衰退的打擊。柯立芝的任期是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九。這六年剛好是經濟十分繁榮的時期。通常所謂「興盛的或喧囂的二十年代」（the Roaring Twenties）就是指這六年的繁榮時期（註十）。在一九二八年大選胡佛已經當選為下一任總統後，柯立芝總統於十二月四日對國會咨文，指出美國的空前繁榮，指出它的工業和企業產生空前的財富，並分配給各階層的人民。他對現狀表示高度的滿意和對將來發展表示十分樂觀（註十一）。

因為柯立芝政府是在繁榮時期當政，他比較容易推動常態政策。他可以指出當時的經濟繁榮是經濟放任主義或經濟保守主義的成果，他可以說這種狀態就是應維持或恢復的常態。在對內政策方面，他不必在方向上有甚麼變更，他只要繼續依靠財長梅倫和商長胡佛去推行一九二一年自哈定總統開始的常態政治，則一切都會順利進行，並維持繁榮、節儉（即避免浪費）、和平靜。他於一九二五年三月初就職典禮中，就指出美國情況良好，將繼續尋求和

平與繁榮，並注意工人的福利、推進工商企業、發展水道和自然資源。他又提及婦女、教育、宗教、和國際間的正義。他對記者表示此次當選後，他的政策不變，和一九二三及一九二四年相同。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初他對國會咨文，開始就對進步和繁榮的一般情況表示滿意。政策在方向上是正確的。人們稱柯立芝的繁榮為「新時代」（New Era）的繁榮。他要求國會節制政府支出，使能進一步減少國債和降低稅率。在他所提出的預算，他只要求增加政府對航空事務的支出。總括在一九二五至二九的四年中，他的對內政策包括下列各點：

1. 常態政治的連續：(1) 限制政府支出；(2) 減少國債；(3) 降低所得稅率；(4) 維持保護關稅；(5) 維持貨幣安定。
2. 為應付新的發展必須增加的活動：(1) 發展航空；(2) 發展水道交通、防洪工作、和有限的對農民的協助；(3) 很有限的擴充商務部工作；(4) 管制無線電廣播。

在外交方面，一九二四年有一個重要的發展，對歐洲經濟安定有很大的影響，它就是道斯計劃（Dawes Plan）的擬定與執行。當時歐洲的首要問題是德國賠款問題和它有關的戰債問題。這個問題各政府經過多年的努力沒有成功。結果在國際商會的推動下，成立由私人組織的委員會去研究這個問題。道斯擔任這個委員會的主席。經過了四個月研究，它產生了一個對各方面的問題都注意到的賠款計劃。再經過半年多的政府協商，在一九二四年內

得到英法德等有關的國家的同意與施行。這大地安定了歐洲的經濟，同時亦有助於美國的恢復繁榮。

在大方向上，柯立芝的外交政策與哈定相同。他們一方面是孤立主義者，都同是承認只在一個和平的世界美國才能享受孤立的安靜生活（註十二）。他們繼續反對參加國際聯盟。他們贊成參加國際法庭（但因國會不同意而無法實現）。

他們在美洲繼續過去的門羅主義，並改外交關係。他們對中國繼續過去的門戶開放主義。

柯立芝任內在外交方面的最大成就就是由美國國務卿凱洛格和法國外交部長白里安（有名的和平主義者）在巴黎於一九二八年八月簽訂的宣佈戰爭為非法的協定。這個協定就是『巴黎公約』（Paris Pact）或『凱洛格與白里安公約』（Kellogg-Briand Pact）。在一九二〇年代，美國和法國若干國際公法學者指出國際公法接受戰爭是合法的，但如能把戰爭認為是一種非法行為，當有助於世界和平。白里安接受這種看法。他於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曾向美國人民宣佈法國願意與美國成立協定，把戰爭宣佈為一種非法行為於是凱洛格請白里安提出具體建議。交涉後決定邀請主要強國參加。在巴黎簽約時，美國、法國、英國、德國、意大利、日本等十五個國家正式宣告廢止戰爭為國家政策的工具，允諾把一切爭端用和平方法解決。（其後蘇聯亦正式參加。）

白里安和凱洛格因此公約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金。

在一九二七年春，柯立芝正式宣佈他決定不參加一九二八年的總統競選。主要的原因，是他當了六年的總統，有些疲倦，希望退休。且他感覺到一九二八年後問題較多，他願意在一切都順利順利的時候離職，這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待續）

註釋

註一：在 Harold U. Faulkner, From Versailles to the New Deal: A Chronicle of the Harding-Coolidge-Hoover Er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 1950)

，該書第二章和第三章討論哈定和柯立芝兩總統的常態政治的一般要點時，就用 "Isolation and Laissez-fair" 和 "Normalcy and Nationalism" 作標題。（頁三二至九二）。但有些歷史家（如 Frank Freidel and Alan Brinkley, Americ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5th.ed. New York, 1982）則認為一九二〇年代在實現國家統一和引起文化變遷等方面，則是繼續進步主義的傳統。）

註二：關於哈定總統，可參閱 Robert K. Murray, The Harding Era: Warren G. Harding and His Administra-

tion (Minneapolis, 1969); The Politics of Normalcy: Governmental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Harding-Coolidge Era (New York, 1973); Samuel Hopkins Adams, Incredible Era: The Life and Time of Warren G. Harding (Boston, 1939); Harry M. Daugherty and Thomas Dixon,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Harding Tragedy (New York, 1932); Arthur M. Schlesinger, The Crisis of the Old Order: 1919-1937 (New York, 1957); Francis Russell, The Shadow of Blooming Grove: Warren G. Harding in His Times (New York, 1968). 關於華盛頓會議，閱最後一書頁四八一至四八五）。

註三：Murray, The Politics of Normalcy (前述書)，頁十四至十五。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美國因本國工潮和俄國革命，流行『紅色恐怖』。閱 F. L. Allen, Only Yesterday: An Informal History of the 1920's (New York, Harper, 1957 Ch. 3)

註四：O.T. Barck, Jr. and N.M. Blake, Since 1900: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Our Times, 5th.ed. New York, MacMillan, 1974, pp. 195

-197.

註五：閱 Murray 前述書（註一）。

註六：參閱 John D. Hicks, Republican Ascendancy 1921-1933 (New York, Harper, 1960)

註七：關於與否定有關的賄賂事件和桃色新聞，閱

"Charles L. Mee, Jr., The Ohio Gang: The World of Warren G. Harding (New York, M. Evans, 1981).

註八：閱 Charles Daves, The First Year of The Budget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23).

註九：關於柯立芝，閱 Calvin Coolidge, The Autobiography of Calvin Coolidge (New York, 1929, 1972 reprint by Academy Books); Claude

M. Fuess, Calvin Coolidge, The Man from Vermont (Boston, 1940) ; William A. White, A Puritan in Babylon, The Story of Calvin Coolidge (New York, 1938); Robert M. Washburn, Calvin Coolidge, His First Biography (Boston, 1923); Donald R. McCoy, Calvin Coolidge: The Quiet President (New York, 1967, 1988); P. Moran (ed), Calvin Coolidge, Eighteen Seventy-Two to Nineteen Thirty

three: Chronology, Document, Bibliographical Aids New York, 1970*.

註十：有不少的專書是討論興盛的二十年代的。把興盛的二十年代與柯立芝連在一起的書，有：

Jules Abels, In the Time of Silent Cal: A Retrospective History of the 1920's (New York, G.P. Putnam, 1969)

註十一：在這裡可以引起注意一點，即柯立芝和胡佛是兩個最後自己寫演講詞的美國總統。此後的總統，其講詞都是由他人代擬，但常經總統本人加以修改。這也代表柯立芝和胡佛是最後兩個主張十九世紀的放任經濟的總統。他們所面臨的政策問題比較簡單，所以總統能親自擬稿。自羅斯福起，美國總統所面臨的問題比較複雜，資料必須由有關部門供給。同時總統也沒有時間去寫講稿。

註十二：關於柯立芝的孤立主義外交，閱 Hicks 前述書（註六）第六章。此書分析柯立芝的經濟繁榮與外交孤立主義的關係，認為二者是同一鑄幣的兩面，但它同時指出，孤立主義與對外尋求和平是相輔相成，而沒有衝突的。



凱風樓詩詞

上下兩冊 共九〇元 金凱達著

本書為作者之自選集，選輯古近體詩及詞曲共六百一十二首，計五七言律詩二百四十一首，絕句及歌行二百四十一首，詞曲一百三十闕。反映了近四十年來世局之動亂，國族之苦難，也紀錄了作者自身之情感與情懷。作者運用古典藝術形式，恪遵唐宋詩詞格律，描寫現代生活。在山川、田園景物之外，將歷史、社會、時事、人物入詩，表現了題材之多樣化，可供愛好中國文學者之鑑賞。代序「中國詩學之規律」一文，為作者學詩之心得。對於聲韻、平仄、對仗等規律，在學理上與創作經驗上均有深度與廣度之探討，亦可供學者之參考。

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卅七號
郵投〇〇〇一六五一號
電話：三一一五五三八